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半塘文库

POETRY AND MORALIT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AESTHETIC AND ETHIC

诗与德

论审美与伦理的互动



赵彦芳◇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 半塘文库 ·

POETRY AND MORALIT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AESTHETIC AND ETHIC

诗与德

论审美与伦理的互动

赵彦芳◇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德:论审美与伦理的互动/赵彦芳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7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2447 - 7

I. ①诗… II. ①赵… III. ①审美 - 关系 - 伦理 - 研究
IV. ①B83 - 0 ②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9591 号

·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

诗与德

——论审美与伦理的互动

著 者 / 赵彦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关晶焱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黄 利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8.6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317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447 - 7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4CZW005)

题 记

文化并非社会的产物，而是对社会
的一种挑战 and 选择。

——阿诺德

总 序

文化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软实力日益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程度是与其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更体现在文化发展水平，这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地理人文空间因素的日益重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出现了区域化研究的趋势。新世纪以来，区域文化的研究与开发较以往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锐利的前进态势，围绕各大区域文化进行的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也不断深入进步。从理论与现实角度考察，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要实现区域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区域文化的优势，挖掘区域文化的资源。

江苏历来是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之地。新世纪以来，为发扬优秀区域文化精髓，建设文化强省，促进全省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江苏省人民政府制定了《江苏省 2001 ~ 2010 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江苏省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以及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流派，要在加强研究、保护的基础上继承创新，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在此思想指导下，江苏各地纷纷提出建设文化大市、文化强市的目标，学术界率先行动，出

版了一批区域文化研究的论著，江苏省教育厅则及时地批准成立了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等一批区域文化研究的重点基地，以推进区域文化的研究和深入发展。

江苏高校林立，各大学因其所处的具体地域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也归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特定的区域文化始终对大学的文化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大学所负载的学术、文化与社会责任感也日益被推上了更高层次的战略平台。因此，研究、挖掘、整合区域文化使之与大学文化有机地融合，不仅对推动区域文化研究与发展，提高区域文化软实力、构建区域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大学吸取特定区域文化精髓的过程，对创建大学自身的特色文化氛围、凝炼大学精神 also 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所缺乏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大学不是一所好大学；同样，一所没有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的大学也绝非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大学。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说过：“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镇，大学的文化、反世俗陈规的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为刺激周边社区的载体，同时也是他们赖以骄傲的源泉。”

扬州大学所处的苏中地区，是淮扬文化的核心区之一。作为淮扬文化区域唯一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扬州大学具有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显著特点。学校集中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精干力量，发挥融通互补、协同作战的优势，继承发扬以任中敏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对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区域文化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挖掘整理其丰厚资源并赋予时代精神，阐扬其独特蕴涵并寻找其与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变革相结合的生长点，以求对地方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江苏省人民政府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对扬州大学进行重点投资建设的基础上，在“十一五”期间对扬州大学继续予以重点资助，主要培植能够体现学科交融、具有明显生长性且预期产

生良好经济、社会效益的五大重点学科，其中包括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凝炼而成的“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学科。这一重点学科的凝成体现了将江苏优秀的古代文化与灿烂的现代文明有机交融、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和发扬光大的理念，符合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已有的专业背景、研究基础和今后的学科发展和学术追求。该重点学科包括“文学转型与区域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与区域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其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以任中敏先生别号命名的《半塘文库》和以区域名称命名的《淮扬文化研究文库》，总计 50 余种学术专著，计 1500 万字。“文库”是“十五”期间“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重点学科研究成果的新发展，汇集了扬州大学众多学者的智慧和学识，体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可谓是一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型文化工程。可以期待，“文库”的出版将对当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五个文明”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科学发展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出版之际，我们向始终支持和关心“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学科建设的教育部社科司、江苏省教育厅的领导及专家表示衷心感谢，对负责定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诸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衷心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丛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扬州大学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
发展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 年 12 月

序

毛崇杰

审美与道德、审美教育中的道德承担、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批评中的道德标准以及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历来是哲学、美学、文艺学论争不休的话题。

《文艺对话录》的开篇，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把一种技艺看成一个有共同一致性的东西，就会对它同样判别好坏。”伊安恭维苏格拉底一番，要他对这句话再加解释，苏格拉底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把一种技艺当作全体来看，判别好和判别坏就是一回事。”这里所说的“技艺”就是艺术——诗或绘画，判别的好坏就是艺术的批评。这个对话的主要意思是谈不同艺术作品批评标准的不一性造成价值判断之难。讨论到最后，苏格拉底把诗歌的好坏归结为诗人是否由神灵附体得到灵感，“大诗人们都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荷马的诗之所以好，“不是凭技艺而是凭神的灵感”。

就“诗与德”这个论题而言，在柏拉图时期显然是道德的东西压倒了审美，这个道德标准是在神那里以理想国的正义出现的，即“我们以什么根据承认国家是正义的，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根据承认个人是正义的”。在柏拉图看来，伦理学的真理就是善，“正义是善，非正义是恶”，善是绝对理念的真理。由于除荷马外许多诗人对此没有悟解，他们的作品与真理隔着三层，所以要被逐出理想国。

然而在古代希腊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没有被柏拉图的道德律令束缚，无论与真理隔着几层，不顾是否会被逐出理想国，他们以诗、剧、雕塑、歌舞、各种造型艺术以及体育竞技，施展自己的天分，丰富自己的生活，塑造着健康、全面、完整的精神与身体的自我。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活动与道德行为在形而上层面上升为美学与伦理学两门人文学科，亚里士多德以《诗学》与《尼各马科伦理学》将它们明确区分开来，奠定了真善美三分的学科性基础。此后，审美与道德、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仍在不同时代、不同侧面反反复复地重新提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以《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分别论述形而上学与美学。席勒以康德为师又力图超越康德，他对康德的道德律令很反感，认为这是理性压倒了感性，他要通过审美游戏的自由实现审美的人与道德的人之统一。其实他对康德的理解有失片面，特别是对康德对形式合目的性自由的强调不够重视。这种片面性以两种相反的极端一直持续到现今，一是把康德美学批判为形式主义；一是夸大康德的道德与审美的非功利性。康德对形式的东西与对真理及道德作为同容的东西同样重视，只是尚未把它们辩证地统一起来，所以有那么多二律背反，以致后来人们常常只见康德这一面，未见其另一面。

进入现代之后，这种关系朝两个极端裂变，一是审美主义，一是反审美倾向。前者以尼采为始作俑者，后者以波德莱尔为代表；前者导致“为艺术而艺术”；后者宣扬艺术对恶与丑的讴歌。其实两者是从相反的方向表达了同一个东西，那就是以唯美的或反审美的艺术形式对资产阶级伪善道学进行颠覆。后现代在现代主义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把矛头指向启蒙现代性。相应于以日常生活实践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后现代主义在美学上一是以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对峙，二是张扬日常生活审美化与高度审美的艺术抗衡。这种倾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性上表现为文化研究之“后学科”特点。所谓“后学科”即出于对现有学院制学科不满的学科性解构与学科边界突破。在美学上以新实用主义美学家舒斯特曼与德国

后现代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为代表，前者除以“身体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性提议”外，还提出“日常生活实践”、“审美的伦理的生活”等作为美学命题；后者一方面批判了后现代审美泛化，另一方面不无矛盾地提出“认识论审美化”、“审美/伦理”等。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性变局语境下，赵彦芳完成了《诗与德——论审美与伦理的互动》一书，这是一个富于时代气息的课题。从博士论文到最后成书，差不多整整十年，这本书从古代希腊到后现代，涉及的人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更难在两大学科的跨越。作者在伊格尔顿的启发下，“试图在美学范畴内找到一条通向现代欧洲思想某些中心问题的道路，以便从那个特定的角度出发，弄清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作者横跨于美学与伦理学两门学科之间追寻“审美与伦理的合一、分裂、再到合一”的路径，提出：“人们以审美的名义开辟着和追寻着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充分实现着人类的潜力，人们也以伦理的名义维护着秩序和稳定，保障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审美包含着伦理的反面，伦理包含着审美的反面。但是，从二者的根本任务——服务于人类更美好的生存而言，二者又是统一的。在西方的历史上，审美与伦理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呈现出统一与分离乃至冲突和矛盾的激化等复杂的变动情况。审美与伦理的划界、边界的消融，艺术的去伦理化，生活的审美化等无不潜藏着重要的人类思维范式、社会、政治、伦理等问题，也潜藏着人类何去何从的严峻问题。”

作者将这种关系“镶嵌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乃至人类未来发展的语境之下”，认为：“后现代，审美与伦理都陷入了困境，失去了与生存的密切关联，成了无论如何都与我们的生存无关的东西，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审美与伦理的去价值化，去深度化，无论是审美还是伦理，都是迷失。作为文化中具有批判性的一种，美学更应该在这一个意义严重匮乏、形上价值严重缺失的时代保持清

醒，为陷于消费性审美的温柔乡而不自知的众生提供一种也许他们不会真正接受却是我们必须提供的警示。”

本书作者指出：“从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演化为福柯的生存美学，从道德是美的前提和规定到伦理决定就是美学决定，从生活中伦理目的至上到美学目的至上，从责任伦理到趣味伦理……，现代性的理性殖民既带来了自身的异化、非理性的抗争，也带来审美话语的崛起，并最终演化为自身的反面——审美的殖民。伦理理性的殖民与审美感性的殖民乃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自我损毁的重要表征。”作者从“反基础主义”与“主体的难题”两大方面展开批判：“后现代无论是哲学层面具有革新力量的审美主义还是与消费力量、科技媒介等结合起来在社会生活中普泛化的审美化倾向，或者说审美的殖民，都潜伏着也在逐渐呈现出审美自身的异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的异化和人类生存的异化。”无论对人物的解析、理论的阐发，还是现实的关切，书中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从中可提炼出两个重大问题，即美学与伦理学的学科性关系与后现代美学家的解读。

美学与伦理学同住哲学大院之中，邻里之间一墙之隔，常有来往，串门、聊天，亲密无间。然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相比之下，美学的这本经比伦理学的经更难念些。从美与善这两个核心范畴来看，在日常用语中，善作为价值判断在道德之外的评价使用率远远低于美，美几乎可以用来作为一切领域的正面评价。“美德”、“心灵美”、“内在美”等等都为伦理学僭夺美学用来进行道德评价。这就好比伦理学缺少酱油、醋什么的，常到美学那里取，相反的情形虽说不是没有，但相比起来却不那么多。在对美学语词的种种学科僭越式挪用中，最容易被遗忘的是鲍姆加登的感性与康德的形式。

在与彦芳多次有关她的这个课题的交谈中，我曾反复提到自己正在做的工作也涉及美学与伦理学及其他学科的关系，特别是2010年我的《“内美”不是美——对于社会美问题的重新思考》

一文初次发表了对于我的导师蔡仪关于社会美的不同看法。“社会美”之所以不是审美范畴而是道德范畴即在于，它以社会道德行为的直接性出场，为道德规范制约，不受美的规律支配，因而不具有审美的感性形式。这一分歧不会改变我始终认为蔡仪以“美在典型”为核心的学说是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科学性比较完备的美学思想体系。在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上，在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上，彦芳无意立即拆除两家之间的墙，我更反对把这堵墙弄得像“柏林墙”那样。学科性关注的同时照顾学科“他性”及“学科间性”与不同学科因其对象真理性认识决定之科学性所划定的学科界限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为思想自由驱动在学术操作上的主体性显示；后者是在学科规定性范围内对科学真理客观性的尊重。在这一课题上，我着意从学科性与科学性墙间区隔来“念”美学和伦理学这两家的“经”，彦芳更偏重两家的亲密交往，指向两本经文的“必然联结”。此外，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出于对学科科学性的注重剔除了过多“批判的激情”，而在彦芳的这本书中处处可以感到理论热情之洋溢。在彦芳研究过程中，她听取我的意见相继做过一些改动，至此再改下去究竟是“谁的”便成了问题。我满意她表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与理论风格。

哲学作为以知识启动世界的改变为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之智慧的学问带动着美学的发展，从理想国到“美是道德的象征”、游戏冲动引向政治自由之路，等等，这些政治、伦理、美学命题，被古今哲人以不同表述方式说了又说，近直至眼下后现代将这些宏大话语作为陈词滥调加以摒弃，人们努力想说出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后现代主义以多元化为契机的颠覆中确实灵动着某种吸引人的张力，正是这种包含着自身否定性之张力驱动着后现代时代在历史的超越与回返之间向着更新、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彦芳在后现代批判中重拾这些道德大叙事，重要的是，在同一性终极目标下之途径差异中发现理论歧点，在多元文化众声喧闹中静听真知之音，沙中拣金，修复几近失语的宏大主题。由于历史的跨度、学科的跨度

以及人物、流派、思潮之间的巨大纵横跨度决定着这一课题的难度，确如彦芳所说：“对材料的消化中，有些被很好地理解了，而有些很可能被错过甚至误读了。”正确的文本解读是一个问题，经过咀嚼、消化之后的吐纳更是一个问题。

2002年前后，彦芳确定这个题目时特别对我谈到舒斯特曼与韦尔施，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当时他们的《实用主义美学》与《重构美学》刚刚译介到国内，我正忙于做《走出后现代》课题，无暇分心。渐渐感到这欧美两位当代美学家的影响之大，越来越发现他们与我所关注的问题极为密切，需要加以研究。2006~2007年间彦芳受《扬州大学学报》之托向我组稿，发表了《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与他的桥梁意向》。2009年我将之纳入《实用主义的三付面孔——杜威、罗蒂、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和文化政治学》一书。关于舒斯特曼在这里不必多说了，关于韦尔施可借机略谈一点。

彦芳的书中写道：“韦尔施认为，审美内在于人类的认识活动，甚至整个存在中，是我们认知和现实中至为根本的成分，是基础的成分，是一种基本原理，整个认识论和存在模式都是审美化的，真理本身就是一个审美化范畴。所以，审美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审美反映现实，而是现实本身就是审美构造出来的。”

2010年陶东风有一篇论文《文学理论：为何与何为》，从注释标明对韦尔施一书的引述达17处，足见该书译介到我国十来年间影响未衰。东风对韦尔施“认识论审美化”的阐发与彦芳同样是到位的，但他们同样所缺的是undoing。韦尔施在undoing美学上取得重构主动权，并不意味着他对美学的undoing作为一种“学科新形式的探讨”本身是不需要undoing的，其“认识论审美化”是特别需要undoing的。

“认识论的审美化”是韦尔施这本书的核心命题之一。由于aesthetics一词包含着“审美”与“感性”之双义，如果用以理解“认识论感性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新意，韦尔施的

意思是“认识论审美化”，而在“感性化”之歧义上使意思含混不清了，这种含混性贯穿于论述的自始至终。认识论的核心是关于真理的问题，所谓“科学美”便由此引出。从“真”与“美”的关系来看，所谓“认识论审美化”的要义也就是真理是否包含的审美因素的问题。

为了使“认识论审美化”取得美学史资源的支持，韦尔施从鲍姆加登、康德开始，到尼采、理查德·罗蒂及维特根斯坦那里广征博引。据之，他认为：“某种趋向真理、形式和认知的审美阐释代表了过去二百年间的基本的哲学过程”。他把这种“认识论审美化”称之为“原型美学”，那就是“审美正愈来愈逼入认知的基础层面”。韦尔施在康德那里的依据主要来自《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感性”一节，从中引出“我们首先（对象）是美学的规定：空间与时间的直觉形式”。因此得出“我们对现实的认知都包含了基本的审美组成部分”。这里有一个极其易于混淆的问题，《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感性”一语在汉译本《重构美学》中译为“先验审美”，有人批评此为误译，正是 aesthetic 这个字引起的麻烦。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意思固然是“感性”，自鲍姆加登之后在美学中便理解为“审美”而区别于西文中的感性（sensation），问题在于韦尔施的这本书讲的 aesthetic 这个字恰恰不是引自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而是引自《纯粹理性批判》，所以更确切地应该译成“先验感性”，恰恰韦尔施对《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感性”理解上的讹错误导了汉译。康德的“先验感性”恰恰属于三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是对象主体直观“通过知性而被思维”的起点，而“认识论审美化”应该确切地理解为“认识论的感性阶段”，而感性在上升为抽象概念与具象观念两条道路上把科学思维与艺术的形象思维分开。在康德的第三批判中，aesthetic 这同一个字便从“感性”化为“审美”。韦尔施以此来论证他的“认识论审美化”是对康德“先验感性”在第一批判与第三批判中不同内涵的理解偏差。康德是划定纯粹理性与判断力的界限，而韦尔施恰恰反其道

以“认识论审美化”消除这道界线，这就等于让康德把《纯粹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合二而一。因此韦尔施断言：“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认知对于感性的依赖性”。从而“没有感性，就没有认知”便成了启发现代美学的一条普遍规律。这里的“感性”仍然可理解为“审美”，“没有感性，就没有认知”就成为“没有审美就没有认知”。语言义上的双义导致美学“审美”与认识论“感性”相互替代错位，一片混乱。

彦芳的书中还写道：“韦尔施创造出伦理/美学（aesthet/hics）一词的意图正在于此。他认为，美学对于生活，不应只是一种装饰关系，而应是伦理/美学的权威。美学的表面可能是装饰性的形式关系，但其内核却是伦理，它追求的目标是公正。”这里借机再谈谈韦尔施的作为“审美/伦理”之“审美公正”问题。

审美主义作为审美现代性思潮对解放个性，反抗工具理性与实用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有着一定的历史作用，韦尔施以“伦理/美学”申张“审美公正”为的是突出后现代多元主义。韦尔施无意把异质性的宽容限制在审美的多元化，他进一步提出了“非美学”与“超越美学”的问题，认为多元化与“美学与非美学”构成了现代审美意识的基本法则，总的精神是给予每一种审美形态以公平的关注，防止偏好，特别注意其中边缘化的，甚至是“虚无”的东西。“关注那些我们感觉不到，想象不出任何东西的地方，或我们以为碰到毫无价值、不足挂齿的东西的地方……”。因为，知觉总是引导着注意力，“导向对不可见、不可听、前所未闻的事物的认可……”。确实，这样一种漫无边际的美学超越，如韦尔施自己所说，“最终导向以美学命名的这个学科的挑战”，以使他的“伦理/美学”成为一种“文化发酵素”对广泛的社会生活发生作用。这种“挑战”并非指向美学的重构，而是引向其解体——在无边的“非美学”异质物进入其边界下美学的解体，不是传统美学的解体，而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解体。当然，处于悖论中的韦尔施并未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这种“超越

美学的美学”指向一种“学科新形式的探讨”。这种以伦理对审美形式的消解为共同点的“审美公正”面目而出现的后现代审美/伦理，与后现代之前传统的微妙差异，在于道德相对主义与柏拉图式的道德专断的绝对主义。

我们对韦尔施的解读也当如席勒对康德的超越，韦尔施对尼采、康德的解读那样有所吐纳，文本中一个“真人”、“真意”正是在永远不断的吐纳中浮现。无论是借鉴舒斯特曼的“审美的伦理生活”，还是韦尔施的“审美/伦理”张扬道德宏大叙事，都要注意这两种伦理东西对审美东西的“殖民”问题。即使到了道德与审美必然联结的时机，无论伦理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其审美的姿态永远不可能摆脱决定于客观的美的规律特有的可感形式之外观。至于不同时代多种多样审美的感性形式外壳所承载的躯体，究竟是以大众化姿态出现，以低俗甚至败坏道德的东西通过消费以追求最大利润；或是高高在上以精心打造的审美包装充斥着贵族式的道学说教；还是对真与善的心灵呼唤，则又是另外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要站到当代西方前沿美学大家的肩膀上说出全新的东西是很难的，不过我们可以从与潮流趋势相反方向来思考一些问题，以力求说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2009年冬，舒斯特曼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来讲“美学与伦理学”关系问题，适逢我的《实用主义的三付面孔》一书出炉，我顺便趁热送了他一本（他说他的中国研究生会向他略做翻译）。后来他向高建平调侃问道，“实用主义的三付面孔”中他是不是“最丑的”一个。有机会我要告诉他：“我所绘制的不是‘美国先生’参赛者的‘审美感性外观’，不是画得‘美不美、丑不丑’的问题，而是‘像不像、真不真’的问题”。在这里“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可扩展为“吾爱吾友，吾尤爱真理”及“吾爱吾徒，吾尤爱真理”，吾侪当共勉之。